

幻象与现实之间：清末君主立宪的尝试与破灭

黄林震，王婧蓉

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DOI:10.61369/SDR.2025020002

摘 要：清末新政期间，清廷面对内外危机，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挽救统治。1905年，清廷派遣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希望通过推行君主立宪巩固统治。然而，《钦定宪法大纲》等改革举措未能触及权力分配核心，反而强化了君主权力，被批评为“伪立宪”。同时，清廷改革迟缓且形式化，未能有效缓解满汉矛盾与社会危机，进一步引发立宪派与地方官员的不满，为革命党的反清运动创造了条件。革命党充分利用清廷改革的虚伪性，通过舆论、军事行动和社会渗透等多维干预手段削弱清廷统治。他们借助《民报》等舆论工具揭露“骗局说”，扩大反清思想的社会影响；多次发起起义，尽管失败，但逐步动摇了清廷的权力根基。1911年，清廷推行《新订内阁官制》与铁路国有政策，激化社会各阶层矛盾，最终导致清廷失去统治合法性。

关 键 词：清末；革命党干预；制度困境

Between Illusion and Reality: The Attempts and Failures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Linzhen, Wang Jingro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During the New Polici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fac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rises, the Qing court attempted to save its rule through political reforms. In 1905, the Qing court dispatched five ministers to investigate Western constitutionalism, hoping to consolidate its rule by promoting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However,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the "Imperial Approval Constitutional Outline" failed to touch the core of power distribution. Instead, they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 and were criticized as "pseudo-constitutionalism". Meanwhile, the reforms of the Qing court were slow and formalistic, failing to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nchu and Han and the social crisis. This further arouse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ists and local official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anti-Qing movem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fully exploited the hypocrisy of the Qing court's reforms and weakened the Qing court's rule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intervention means such as public opinion, military actions and social infiltration. They used public opinion tools such as Minbao to expose the "fraud theory" and expand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anti-Qing ideology. He launched many uprisings, although they failed, they gradually shook the power foundation of the Qing court. In 1911, the Qing court implemented the "Newly Established Cabinet System" and the state-owned railway policy, intensifying the conflicts among all social strata and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loss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Qing court's rule.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revolutionary Party; intervention institutional predicament

引言

晚清时期，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立宪与民主共和思潮涌入中国，形成了立宪派与革命派。清末新政时期，清廷试图通过立宪实现政治改革，以维持统治。然自1906年以来，改革步伐缓慢，且因制度缺陷，屡遭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批判。目前，学界对预备立宪的败因已有众多研究，多从清廷改革的动机、制度设计等视角展开研究，认为清廷立宪的根本目的只为“皇位永固”，难以实现政治转型，且立宪派本身所设的立宪体系亦具有漏洞^[1]。然而，对革命党如何通过多维度干预立宪进程、并主动塑造社会变革进程的研究相对较少。

基金项目：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清季预备立宪期间“国族”建构困境及其影响”（YCYB2024110）的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

黄林震（2001-），男，福建泉州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制度史；

王婧蓉（1998-），女，甘肃康县人，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国妇女史。

基于此，本文聚焦于革命党对清廷预备立宪的“多维干预”，分析其如何利用清廷的漏洞与社会矛盾，通过舆论，分化立宪派与清廷间的关系；发动军事行动等手段，加速清廷的灭亡，并最终促成政权崩溃与辛亥革命爆发。研究不仅揭示了革命党干预清廷改革的动态机制，也为理解清末政治转型的复杂性提供了新视角。

一、清廷体制改革的失误与“骗局说”的初步形成

1901年，清廷开始实施新政，如开办新式学堂，并在学堂课本上明确提出：“立宪之国，法律为国民所共认^[3]。”这一举措说明清廷已对立宪具有初步认识。20世纪初，立宪主张逐渐成为社会讨论的核心议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对此已众说纷纭，1901年，梁启超再《立宪法议》中对世界政体进行分类，认为“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3]，并进一步提出实施立宪的六大步骤：其一，将君主立宪制作为本国政体，不再变更；其二，派大臣游历各国参考宪法和法律，以一年为期；其三，设立法局于宫中，草定下宪法以供随时审阅；其四，将各国宪法法律原文翻译并颁布天下，以提升民智；其五，将草拟完成的宪法颁布天下，供国民审阅，并让其提出修改意见；其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起，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4]。“自此，国内舆论对立宪的讨论日益热烈，尤以1903年最甚^[5]。”可以看出，清廷的官制改革原本试图通过表面调整争取更多士绅与民众的支持，却因满汉不平等和改革内容的保守性，成为革命党攻击的靶子。在舆论战中，革命党抓住改革的种种漏洞，将其塑造成“骗局”，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各界对清廷改革动机的不信任。

二、同盟会的成立与反清运动的深入推进

1894年1月，孙中山致信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以西方资本主义为蓝本推动中国的改革。然而，李鸿章对其建议置之不理，使得原本对改革抱有幻想的孙中山逐渐转向革命道路。同年11月，在檀香山，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并在海外活动中寻求革命援助^[6]。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孙中山认为革命时机已至，派遣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前往香港、惠州筹备起义，同时部署部分起义军牵制广州清军。然而，两广总督德寿早已部署防御力量，令惠州起义遭遇军火短缺及外部阻力。最终因外援无望，孙中山指示起义军“自决进退”，义军因弹尽粮绝被迫解散^[7]，惠州起义失败。这次挫折进一步让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成功需要更大范围的组织化和统一行动。

孙中山认识到，单靠言论和分散的地方行动不足以抗衡清廷，必须联合各地革命组织，形成统一阵地。1905年8月，孙中山联合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8]。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刊物，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阵营开始走向全国统一^[9]。不仅如此，这一组织

还成功吸引了部分对清廷失望的维新人士加入，为全国性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尽管如此，革命党内部对于部分维新人士的忠诚度仍存疑虑。为此，革命党创办《苏报》、《国民报》等报刊对立宪思想加以批判。对于光绪帝，则是“今安中国复安所得同胞同种之王而奉为无责任之元首乎？”无实权的皇帝、对立宪认识模糊的官僚群体，注定了清廷君主立宪的失败^[10]。

三、革命党的双轨策略：起义与舆论

1906年12月，同盟会成员从日本潜回湖南，与当地会党、煤矿工人及部分兵勇联合，筹划武装起义。12月4日，革命党发布剿匪檄文：“

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

这次起义与同盟会的宗旨高度一致。孙中山在事后评价：“丙午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之师也”，然因“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导致指挥不力。至12月12日，“同盟会核心成员才在日本知晓起义”，尽管义军初期取得局部胜利，但很快被清军围攻包抄，最终以失败告终^[11]。

1907年初，孙中山抵达越南河内，策应潮州、惠州、廉州三地的起义行动，但因准备不足及清廷镇压，均以失败告终。1907年底，孙中山与黄兴在镇南关发动起义。起初义军行动迅速，打得清军措手不及，一度引发清廷恐慌。军机处紧急致电两广总督张人骏与广西巡抚张鸣岐：“

匪徒在越界秘密布置，想必备有军械，又难保无外匪暗中接济，自非寻常土匪可比。著张人骏张鸣岐预为筹备，扼要屯防，并胶飭沿边文武认真截堵，切勿稍涉疏虞，钦此^[12]。”

义军取得了短暂的战果，占领了镇南、镇北、镇中三座炮台，缴获400多支军火，收获颇丰。但清将陆荣廷以缓兵之计诈降，使清军与其里应外合，大破义军，义军仍坚持抵抗，于9日凌晨时被迫撤出炮台，起义失败。1907年，徐锡麟与秋瑾计划在皖浙地区同时发动起义。此前徐锡麟已深得安徽巡抚恩铭赏识，同时暗中秘密联络会党，发展成员，准备发动起义，然因光复会成员被捕，供出会党名单，导致起义只能提前，以失败告终。

这期间，清廷的立宪改革并未缓和社会矛盾。1906年9月24日，清廷对外宣布官制改革的结果，按规定“除内阁、军机处一切现制、著照旧行，另拟设十一部、七院、一府，其中新设十一部中、外务部、吏部均属照旧”，其所设各部堂官均设尚书一员、

侍郎二员，不分满汉。”这一安排引发舆论广泛质疑，立宪派对此深感失望，徐佛苏直言此次改革“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清廷此举令“他党近来势颇发达，其排斥立宪之声，如蛙鸣之躁耳”，而立宪派只能“最受唾骂。”汪精卫则在《民报》中批评清廷改革“犹人之戴面具”，迅速抓住这一舆论突破口，揭露清廷改革的虚伪性与专制本质。他们指出，清廷的立宪本质上是维护满洲特权，而非真正推进失望之余，也对清廷改革的方向产生疑虑，为革命党的宣传提供了更多支持^[13]。

四、改革失衡与清廷覆亡

1908年8月，在庆亲王奕劻等上奏推动下，慈禧太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分为两部分，分别为“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力义务”。其中“君上大权”共14条，核心在于确保君主权力的至高无上，包括召集与解散国会、统率军队、任免官员、宣战与媾和等重要职权。而“臣民权力义务”则规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等权利，同时要求臣民履行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然而，《钦定宪法大纲》通过着重强调君主特权而对权力限制重视不足，进一步凸显其“伪立宪”的本质。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草本，但在“君权”设置上更为扩张，其权力范围甚至超过了日本明治宪政所赋予天皇的权限。对此，而宋教仁在《日本内阁更迭感言》中指出：“世之论政体者，往往谓日本为半立宪国。”相比之下，清廷的宪法大纲更显专制，根本无法称之为真正的君主立宪。革命派对《钦定宪法大纲》提出严厉批判，认为其本质不过是专制统治的延续，甚至嘲讽其为“伪立宪”。而立宪派却仍寄希望于清廷能够通过宪政改革实现政治转型。

1909年，各省咨议局陆续成立，但咨议局与地方督抚围绕权力划分的冲突日益加剧，地方政治陷入内耗，无暇顾及实际的立宪筹备工作。在这种危局下，1910年，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国会请

愿运动，要求清廷立即召开国会推动宪政改革。在各方压力下，清廷被迫让步，宣布国会将在1913年召开。然而，这一迟缓的回应令立宪派极为失望，认为清廷并无实质改革意图^[14]。

自1909年起，载沣出任摄政王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将军政大权集中在皇族手中。他的两位弟弟分别掌管军权与军咨处，形成了以载沣为核心的“皇族统治集团”。孙中山更是直言：“你看他们三兄弟（载沣、载涛、载洵），一个监国摄政，暂行大元帅之职，是一切军权都操纵在手里了；一个管理军咨处，军咨处就是德日参谋本部；另一个筹备海军的大臣，这样就可以看出大权已在他们三兄弟手中。”这种做法加剧了满汉矛盾，使得“皇族宪法”的批评不幸言中，进一步压缩了立宪改革的空间。

面对持续的舆论压力和地方反对，清廷的统治根基逐渐瓦解。革命派、立宪派与地方封疆大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些原本分裂的势力在共同反对清廷的过程中形成了联盟。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地方汉族官吏与立宪派选择坐视不管，清廷的“皇族宪法”成为压垮清朝的最后稻草。

五、结语

从大体而言，清末立宪运动的失败表明，清廷既未真正理解立宪精神，也未能有效调和内外矛盾。在革命党、立宪派与地方官员的多重压力下，清廷的政治改革步伐不仅缓慢而且混乱。其推行的预备立宪，更多是维持专制统治的工具，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权力结构。皇族内阁的出台、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等一系列失误，不仅触及了地方利益，更引发了立宪派的强烈反对，为革命力量的壮大提供了契机。然而，清廷的失败不仅仅是体制改革的延宕与失误，更是其在内忧外患之下丧失政治合法性的必然结果。这一段历史不仅是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失败案例，更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与近代化探索的重要缩影。

参考文献

- [1] 请参阅周叶中，江国华. 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 [J].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胡继武、金冲及. 论清末立宪运动 [J].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陈忠云. 清末民初政治制度改革失败原因的研究 [J].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易斌，探析晚清预备立宪时期官制改革的失败原因 [J]. 宜春学院学报，2008(2)；李月. 清末“预备立宪”：一场宪政“闹剧” [J]. 中国人大，2010（1）；田一雯. 从心理角度浅析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5）；侯宜杰. 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 [J]. 史学月刊，1991（4）；刘舒杨，王浦劬. 清末预备立宪民主改革失败的策略互动分析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6）；张静. 从反现代化角度看清末预备立宪 [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10）。
- [2] 毕苑. 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 [J]. 福建教育出版，2010（180）。
- [3] 梁启超. 立宪法议 [J]. 饮冰室合集，1996,(01):1。
- [4] 梁启超. 立宪法议 [J]. 饮冰室合集，1996,(01):6-7。
- [5] 侯宜杰.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革命改革风潮 [J].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0。
- [6] 余肇康致止公相国函 [J].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五日。
- [7] 侯宜杰.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革命改革风潮 [J]. 沈阳人民出版社，2020，53-54。
- [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 [J]. 中华书局，1979,1。
- [9] 余肇康致止公相国函 [J].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五日。
- [10] 任增霞. 晚明与晚清时事小说研究 [J]. 南开大学出版社，2021,174。
- [11] 《吴稚晖书·暗杀时代》，转引自黄波：《被打断的近代化》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 [12] 转引自吴稚. 意见书 [J]. 民报，3；张枬，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册 [J]. 三联书店，1960年，391-392。
- [13] 《陈天华集》，转引自黄波编著：《被打断的近代化》，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
- [14] 徐凤桐. 颐和园趣闻 [J]. 北京出版社，2000,91。
- [15] 转引自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革命改革风潮》. 沈阳人民出版社，2020,第45页。